

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

主编

周天游



北京大学出版社

083
8
31

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

周天游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新登字011号

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

周天游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一分厂印刷

789×1092 毫米 1/16 开本 13.5 印张 295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7-5604-1003-0/K·124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

- 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乔志强 行 龙 (1)

开拓历史空间运动领域的研究

- 区域社会的历史哲学思考 王玉波 (9)

往事·正史·现代生活

-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若干启示 定宜庄 胡鸿保 (16)

地方传统和文化人类学方法论

- 从法国看福建一地方实例 [法]贝桂菊 (23)

中国古代社会的地域性研究 [日]藤田胜久 (28)

当代农村宗族组织结构的转型及其意义 钱 杭 谢维扬 (32)

社会转型期江南宗族的变迁

- 徽州方氏研究之一 唐力行 (40)

论徽州的家产分割 [日]白井佐知子 (48)

家族组织的整合与乡绅

- 乐安流坑村“彰义堂”祭祀的历史考察 梁洪生 (57)

竹木贸易与明清赣中山区土著宗族社会之变迁

- 乐安县流坑村的个案研究 邵 鸿 (68)

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 王日根 (78)

日本学界关于明清时代宗族问题的研究 [日]井上彻 (86)

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和“礼”的起源 李禹阶 (95)

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对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影响 ... 秦宝琦 孟 超 (105)

莆田江口平原的里社与村庙

——关于“祭祀圈”的新例证 郑振满 (112)

三山国王信仰与清代粤人迁台

——以乡村与国家的关系为中心 陈春声 (118)

明嘉靖初年广东提学魏校毁“淫祠”之前因后果及其

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 [英]科大卫 (129)

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的几点比较 赵世瑜 (135)

唐京的恶少流氓与豪雄武侠 葛承雍 (145)

阳明先生重建社区治安理想与实施 (香港) 马楚坚 (156)

试论齐文化的形成及对秦汉政治的影响 赵润生 马亮宽 (167)

汉代三辅研究(摘要) [韩]崔在容 (177)

再论唐代岭南发展的核心性 (香港) 刘健明 (180)

商业文化与民俗文化的联姻

——近代武汉商事习惯与民俗传统 严昌洪 (187)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

——“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周天游 葛承雍 (195)

后 记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①

——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乔志强 行 龙

地域社会史，简言之即地域范围的社会史。在这里，地域的含义包括：(1)它是一个人类活动的空间概念，是指一定的疆土范围；(2)它是一个地域系统，是一个相对概念，大到全球，可以包括整个人类的社会史；指一个国家即成为某国的社会史；指某个地区，即可规定为如华北农村社会史或某个城市社会史，还可以再缩小范围；(3)地域社会史的地域，它的划分是以社会及其发展的相近性为标准，而不是地域经济史以经济、地域文化史以文化来划定。当然，在社会及其发展相近性很大的地域，与其他地域就有很大的相异性，但也有某些方面的相近性；同时在地域内部除相近性很大而外，也有某些相异性。因而根据采用标准不同，地域可以划大划小，有相对性和重叠性；(4)地域社会史是研究一定地域内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但社会及其发展与自然、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及其发展有密切的相互的多元联系，因而地域社会史既不同于地域经济史、地域文化史等，但又密不可分，隔绝与混同都是不科学的。归结上述，地域社会史是以社会及其发展的相近性为依据而划定的一定地域的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

(一)

以一定的地域范围来研究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实践效用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地域社会史往往被视为仅是一种个别的、微观的研究，甚或看作为整体的、宏观的研究之附庸，这种认识其实是史学方法论上的一种误解。在史学研究中，宏观与微观，个别与整体只是相对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具体的史学探讨，不会有一般的史学成果，反之亦是。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不全是由这种选题角度的宏观与微观、个别与整体所决定的。相对于特定国家内特定的地域研究而言，全国性范围的研究可以说是宏观的、整体的，但相对于跨国界的世界范围的研究而言，全国性的研究又只能是一种局部的、微观的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况且，宏观的历史研究固

^①本文为乔志强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研究》论文之一。

然可以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结论，而微观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也未必都是个别的、只适用于局部地区的定论。被恩格斯称为“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①的《古代社会》，正是摩尔根对北美魁北克印第安人亲属制度的“微观研究”，布罗代尔那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性的”^②《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也只是对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微观研究”，从地域角度讲，整体社会无疑是多地域社会相互联系的结合体，地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整体社会史的深入研究，而且可以验证某些论点，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论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③

仔细审视西方社会史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整体社会史与地域社会史研究并非互相排斥，难以融合，而是互相渗透、并行不悖。以最富盛誉的法国年鉴学派为例，费弗尔和布洛赫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伊始，就力主“唯一真正的历史就是整体的历史”，而“新的历史学是‘全部整体构成的历史’。这就是说，它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④正是这种整体的历史观扩大了传统史学的领域，使得越来越多的历史内容被纳入到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中，越来越多的人文学及自然科学方法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中。检索年鉴派60余年来四代学者林林总总的研究成果，从地域角度出发的论著占有突出地位：年鉴派创始人之一费弗尔的名著《腓力普二世与法兰西康德地区》是典型的地域性著作；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至今被视为社会史研究的典范；第三代学者中最具影响的代表作应是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以及马纽埃尔·勒鲁瓦·埃迪里的《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第四代学者对地域社会史给予更多的关注；G·杜比的博士学位论文《11~12世纪马贡地区的社会》等均有相当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派学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溶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⑤这种关注具体研究的倾向与史学研究多元化广泛深入，总体史概念在方法论上受到质疑的情况相伴出现，从而影响到70年代至今的史学潮流。”^⑥可见，整体社会史并不排斥包括地域社会史在内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手段，而地域社会史则以特定地域内经济、社会等多层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2页。

②[法]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③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④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⑤均参见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的《史学研究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出发去把握这一总体性，从实践中推动整体社会史的深入发展，这正是几代年鉴派学者走过的学术轨迹。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近代社会又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从地域角度探讨各地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早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且有相关成果不断出现。如“七五”期间对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史的研究成果均已问世，对江南市镇、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研究也已取得丰硕成果。其他如以省为区划单位的近代史著作也有多种已出版。海外学者不少有关中国近代地域史的研究也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①

7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开始倡导以中国社会内部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这种取向被柯文（Paul A. Cohen）称之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其中，“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中国历史”，“把中国按纵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是其重要的两大特征^②。在“中国中心观”为主流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黄宗智和施坚雅的地域社会研究着实令人注目。黄氏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在美国史学界很富声誉，其研究“重点在于一个特定区域和社会阶层”^③。施坚雅在对晚清城市的一系列研究中也以地域为出发点^④。他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核心——地缘说，等级——规模说，地域周期发展说，对探索中国地域社会史乃至中国的历史结构，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在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除以“大区”为范围的地域研究外，对省一级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对府、县乃至村落的研究也开始引起研究者关注^⑤。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以上这些成果不一定都属于社会史研究，但这些区域为探讨范围的研究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综上所述，研究地域社会史的必要性是十分明显的，这可归结为几点：（1）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在区域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相对相异性，地域内则存在着相对相近性，这是客观存在。因而按地域分别研究社会史是符合客观实际的；（2）整体和局部是相对的，从地域局部来探讨，更能从地域的大小体系之间及其相互之间深入研究其特色，有利于进一步作宏观、微观及比较研究，便于使这些研究沟通；（3）冲破以行政管理区划及用朝代断限来研究社会史的局限，以社会及其发展来确定社会史的研究空间范围和时限，可以拓展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社会史；（4）从实际应用

①[美]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②[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页。

③参见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④参见柯文前揭书，第144~149页。

而言,研究地域社会史不但可以科学掌握本地域的社会史,而且有利于协调发展地域间新的社会生活的建设,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也应当注意,地域社会史只是社会史学科研究的渠道之一,它不能代替整体社会史、系统社会史、专题社会史的研究。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辩证统一关系,不可偏废。

(二)

如何划分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地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在此问题上各界学者提出过不同的划分标准。国内经济史学界曾对历史上经济地域的划分展开过讨论,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以行省作为地域划分的基础或主要标志;(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3)采取多元标准,既可按行省区域,也可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①。施坚雅在对晚清城市史的研究中提出了划分地域的四条标准:水系及周围的山脉是主要的,也是天然的界标;地域内的贸易量是重要依据;一些经济数据,尤其是人口密度可以为辅助性标准;高级中心地功能所覆盖的最大范围的腹地可视为地域^②。在借鉴上述相邻学科有关地域划分标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社会史研究中的地域划分还应充分考虑到社会史本身的三个问题:一是从研究“社会”的角度出发,注重地域社会“整体的历史”,近代中国各地域间存在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域社会史的区划应充分考虑地域内社会各种因素的整体性,寻求社会因素各方面有共同联系和特点的地域,作为地域研究的范围。第二是要考虑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研究农村社会史,要充分考虑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交通运输、作物种植等在地域内表现出的相近性。农村社会还具有相对的落后性、停滞性,这又需要考虑到历史传承性。第三是要考虑地域社会史与其他地域史的关系。地域社会史不同于地域经济史、地域文化史等,但又密不可分。据此,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大致包括山西、直隶(包括京、津)、河南、山东四省二市及内蒙、陕西部分相邻地区;从地理范围讲,大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清代中国的人口与市场网络》中称此地域为“北方”^③。

有关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具体内容,基于我们对社会史研究范畴的理解,我们认为主要应研究以下三个方面的历史:社会的构成,主要研究人口、家庭、宗族、社区、阶级、阶层等社会组成因素及其存在的各种形态的发展和变迁;社会生活,着重研讨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及其变迁,旨在反映社会如何运行和发展。社会功能,主

①见《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②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施坚雅前揭书。

③参见[美]Gilbot Rozman: "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settlements in Ching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要探讨社会控制、调节等多种机制和功能的发挥和发展,以及当社会受阻和产生弊病时,如何进行调整和变革。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的历史相互之间实际是“互为因果,相互说明,彼此依赖,合乎逻辑地,完整地成为一个体系,用来阐明这个社会整体以及它的发展的历史。”^①在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具体地域和时段的研究中,我们还将注意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力求从实际操作过程中反映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特征。

第一,内部结构与周边联系。社会史研究的主体是社会本身的历史,人类社会各种生存和活动的方式及其互相关系是其研究的侧重点,如果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包括在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中,那社会史也就无异于通史,社会史的学科特征也无法得到体现。但是,社会史研究决不能忽视与社会相连的各种周边联系。众所周知,社会及其发展决不可能脱离开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发展,这些被有人称为广义社会活动的历史与社会史交叉影响,共同构成通史,它们与社会史都是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可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与社会史分开研究,但相互之间有彼此影响的交叉多元联系,我们在研究社会史,包括地域社会史时,应既研究社会内部结构的历史,也研究与外部周边联系的历史。如何将这些研究内容的内部结构和周边联系的剖析结合起来,这就是要将“社会”置于历史发展变迁的总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在把握总体社会变迁的基础上,具体考察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以及相互关系与内在联系及其发展。离开对整个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认识,对社会内部结构的研究也难以深入下去。另外,在这种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历史时段的划分问题,社会史并不必要像通史那样按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据,而应该以社会本身发生某种本质变化的时段为依据,如此才能够体现社会史的学科特征。

第二,具体特征与基本线索。任何社会的历史变迁总有一个基本的、客观存在的趋势存在其中,如何将社会发展变迁各个方面的具体特征与基本趋势结合起来考察,以反映“整体的历史”,需要有一个“有似绳索贯串钱物”^②的基本线索。就中国近代社会史而言,我们认为,能够体现社会本身发展变迁基本趋势的线索应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化过程,就是社会的近代化过程^③。换句话说,中国近代社会史应当以“社会近代化”为基本线索,探讨社会本身如何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化过渡的历史变迁过程。华北近代农村社会变迁,包括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演化,工业化发展及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宗法制家庭关系的松弛,小家庭趋向,社会阶层的相对广泛流动性,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多样化、丰富性,社会控制调节逐步规范性等都是“社会近代化”

①参见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部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

②见陈旭麓《关于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对“现代化”与“近代化”概念的使用国内史学界并未严格区分,我们把近代史上发生的现代化过程称之为“近代化”。

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从事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的主要内容。

第三，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农村与城市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研究农村社会必须与城市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从地域角度出发，研究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在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城市的变迁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天津取代了明清以来北京在华北地域内的核心地位，一批过去因政治军事地位，或因地理、交通条件优势而繁荣的传统城市的衰落，一批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或因新的交通运输（如铁路的修建）条件改变而崛起的新兴城市的发展（这一点不同于沿江沿海多为商埠和租界城市），城市功能和作用的改变等，都对近代华北农村的社会变迁带来巨大影响。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城市密切相关，研究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不仅要研究农村社会本身的变迁，而且应当研究有关城市社会的变迁，以及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发展变迁的相互关系，如此才能呈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立体画面。

(三)

在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我们力求侧重以下几种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旨在突出地域社会史的特征。

第一，比较方法。比较方法一直是社会史学家从事具体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的方法之一。地域社会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比较研究，在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我们将侧重以下几方面的比较。一是横向比较。就是从空间角度出发，从不同角度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来看，大致存在着四种不同类型的层次，即沿海型、中部型、内地型、边缘型。沿海型以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为典型，这是近代中国受到外力冲击的最早地区，也是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欧风美雨以此为前沿逐渐传入腹地。中部型以长江中游为代表，这些地区社会近代化起步较沿海为晚，但由于毗邻沿海，或由于交通地理条件的优越，也很快发展起来。内地型以华北和四川等地为代表，其特点是闭塞性较强，与外界联系较少，社会近代化起步较晚，发展程度也非常有限。边缘型以西南为代表，各方面的社会变迁较上述三种类型均有明显差距。就总体来讲，社会近代化程度和速度存在着一个从沿海到腹地递减的态势。近代华北农村变迁要与其他地区进行具体比较，揭示华北农村变迁的特征即与其他区域的相异性。第二是纵向比较。“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①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社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4卷，第287页。

社会变迁过程，必须与不同时期的华北地区进行比较，尤其是与明清以下的华北农村社会相比较，才能反映出近代的特点。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中各个方面与古代有何不同，都是需要进行比较分析的问题。第三是综合比较，也就是从“整体的历史”的社会史学科特征出发，比较华北与其他地域及本地域古代到近代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比较其间的相似性。比较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通过这种综合比较，要力求总结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和带有规律性的结论，进而为整体社会史的研究作出阶段性成果。

第二，计量方法。计量方法是社会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战后历史科学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计量方法运用到社会史的具体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更加科学地反映全面、整体的历史，更加全面地反映“自下而上”的历史。相对于主要研讨少数上层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历史活动而言，社会史更多地是探讨社会本身及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历史，计量方法正可以在此得到发挥。事实上，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具体内容本身就具有数量的性质。比如人口数量的演变、人口的城乡结构、性别年龄结构、婚姻及婚姻圈、家庭宗族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物质生活消费、教育文化程度等等，都可以运用具体的计量方法使研究结论更加科学化而减少随意性。当然，将计量方法真正完美地运用到研究过程中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这时不仅有对历史数据的分类、整理、分析的具体问题，也有数理统计，甚至计算机的利用等问题，需要史学工作者进行一番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与补充过程。而且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数据多是标准不同、残缺过多、可靠性差，整理、使用起来难度也很大。在对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我们将力求使计量方法得到体现。

第三，学科渗透法。社会史是研究社会本身“整体的历史”，这一学科特征决定了社会史与相邻的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都有一种交叉和重叠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研究内容上，而且表现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充分利用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仅是西方社会史学家孜孜以求的学术态度，而且是深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重视的问题。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则尤应注意更多地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说：“从理论上说，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都是社会，但是这两门学科的历史发展导致两者的差异。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①另一位前苏联社会学家米罗诺夫则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同样的道理，他认为“可以明显看出历史学家向往着历史观的立体性、多层次性和综合性。社会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系列概念，使历史学家能够提出新课题，重审传统

^①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课题，使研究客体成为多维的，‘深邃的’。”^①西方社会史的兴起不仅与社会学的推动密不可分，而且它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与吸收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密不可分，年鉴学派正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相互交流的榜样。我们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包括地域社会史的研究中，并不是我们充分吸收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而是吸收的仍然不够。当然，这种吸收并不能仅限于对社会学概念理论的生搬硬套，而应以社会史的特征为出发点，进行重新整合与提炼。相信多学科渗透，尤其是社会史与社会学的渗透，必将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系)

^①[苏]米罗诺夫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开拓历史空间运动领域的研究

——区域社会的历史哲学思考

王 玉 波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在时间与空间的流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社会史。所以，社会史，既要再现社会的时间运动过程，也要再现社会的空间运动过程，还要把二者统一起来。从再现社会空间运动过程的角度来看，开拓区域社会史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历史的时间运动

历史是由时间运动过程构成的，没有时间的推移，就没有历史的顺序和延续性，就没有历史过程，也就没有历史。如果没有“时间隧道”，社会也将凝固不变，从而无社会史可言。历史的这一特点，使人们用语言或文字的信息手段再现历史，一般都按年代顺序叙述事物、社会如何在斗转星移中世代更替的。不但古代诗人用“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来形容历史^①，就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认为：“历史是时间的等同物”。

不过，时间运动有其特性：它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和等速的。时间运动是纵向的，并且按照纵向的某个唯一方向前进，由过去到现在，由现在到将来。没有横向的时间和相向的时间，时间只能是单向的。时间也是不能倒转的，连孔老夫子也只能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②所以它具有不可逆性。时间运动又是等速的。如果说水流是可以变速的，时间流动则是机械的等速流动。没有等速的时间，历史将难以准确的计算。

由于时间运动的上述特性，如果把历史仅仅看作是时间运动，就容易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单向的、直线的线型运动过程，从而有可能把十分复杂曲折的历史，看作是一个简单、机械的过程。在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条件下，又可能把这种线型运动过程模式化甚至教义化，以致把历史研究被禁锢在固定的模式框架之中，难以真实地再现历史。而且，即使抛开这一因素的制约，如果把历史宥于狭隘的“时间隧道”之中，离开

^① 孟浩然《与诸子登岷山》。

^② 《论语·子罕》。

了历史的空间运动过程，也难以把握历史的“力场”，再现历史事件、社会演变的丰富内涵和捕捉其内在动因，难以把握历史的因果联系。

在我国社会史研究中，迄今还深受把历史看作是纵向的、直线的线型运动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如，社会历史是由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几乎成为不可逾越的神圣模式，学人要探究，只能在这一模式的框架内发掘。其实纵观世界各地，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出现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历史。再如，在原始社会史和家庭史的研究中，学人也往往囿于五种家庭形态（血缘家庭、普纳路亚家庭、对偶家庭、父权家庭、一夫一妻家庭）依次演进说和人类初期由乱婚杂交进化为群外婚，从而形成氏族，氏族又由母系而父系，氏族社会崩溃才出现国家的模式框架之中，似乎一切民族、国家概莫能外。但是，现代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初期不一定存在过杂交乱婚的“血缘家庭”，两性联合体的对偶家庭，很早就普遍存在，甚至人类祖先近亲的黑猩猩也存在“乱伦”禁忌的小家庭。所以，血缘家庭、普纳路亚家庭属于虚构。至于氏族，也并非是每个原始群组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是否经历过氏族社会，与生态环境、群体的文化发展程度等因素有关，爱斯基摩人就没有经历过氏族社会阶段。氏族社会中，也并非都是单系的，由于对祖先的认同方式不同，有各种继嗣群体，包括双系的、并系的等等，不止是有单系的母系或父系。即使母系演进为父系，也是曲折复杂的过程，并非直线演进。如我国云南永宁纳亚族家庭，近代还有上一代是母系，下一代是父系，再下一代又是母系或双系并存的状况。至于国家是否一定要到氏族解体后才出现，也需要根据近年考古发掘和文献重新探讨。

历史的空间运动

历史不仅是由时间运动构成的，也是由空间运动构成的。事物、社会存在于多维的空间之中，没有一定广延的空间和在空间中以多种形式的位置移动，就没有历史，没有社会。从社会史来看，空间运动是社会历史主体活动的基本内容，它表现为个人、群体、区域间一定广度、向度、速度、频率的各种各样的交往互动，信息传递与反馈，这是社会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因，甚至可以说，没有空间运动，就没有人类社会。因为根据人类学研究，人类远祖的猿类，是由树上转移到地上生活，才逐渐演进为直立人的，从此才解放了双手，使用和制造工具，使大脑日益发达，并在人际交往中产生了语言，在群体间的联姻中形成了氏族社会。此后，人类社会的任何发展、演变以及曲折，也都与人际之间、群体之间、社会之间、地区之间的横向交往是分不开的。在我国，也正是由于在广袤的多元文化起源的大地上的错综复杂的空间运动，包括贸易、战争、联姻以及文化交流等等，在不同氏族、部落、民族间的互动与融合过程中，中华民族才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在我国社会各个时期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形成特定的格局，都

与不同形式的空间运动是分不开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是直接当时学者和不同学派有其自由思索和生存的空间，并且互相交锋与四出游学是分不开的。秦汉消除了这种学术生存空间，从此形成了两千年文化专制的格局。汉以后，作为文化载体和劳动力的人口国内流动，对华夏文化的形成，对国内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隋唐以后江南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和文化发达，是与两晋士族与大量人口南下及北宋后期宋王朝迁都与民众纷纷南徙是分不开的。中国社会历史也表明，历代国家强盛和社会繁荣，都与对外开放有关，而国家衰败和社会落后，都与自我封闭相联。汉、唐与明末、清代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点，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既是事物、社会在空间运动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在时间运动过程中形成的。空间运动与时间运动并非互不相干的平行线，二者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因而历史是由纵向的时间运动与横向的空间运动相互交织的立体结构。然而，时空运动并不是均质、均势的，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特点的历史阶段。漫长的时间运动与缓慢狭小的空间运动相组合，成为古代历史特征；短暂的时间运动与迅速扩大的空间运动相组合，成为近现代社会史的标志。不过，无论时空运动如何组合，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能是没有空间运动的时间运动，也不可能是没有时间运动的空间运动。

有一种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史是纵向的时间运动史，近代才开始了横向的空间运动史的观点值得商榷。

我国近代进入了广泛迅猛的空间运动时期，在空间运动过程中，社会历史大踏步地前进。然而，这不等于中国古代史只是或基本上是时间运动史。我国自商周甚至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开始对外交流，春秋战国时就形成了丝绸之路，秦汉至唐，对外的经济、文化交往不断扩大，这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繁荣、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对世界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至今仍使西人认为：“公元1400年，中国是世界上强大最先进的探险王国。”^①遗憾的是后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远远地落后于西欧、北美、日本。但不能由于近三百年来落后，否定中国古代历史的空间运动。不仅如此，我国辽阔大地上几千年、上万年来的各民族、部落、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也表明中国古代社会史，既是时间运动过程，也是空间运动过程。当然，古代条件下的空间运动，远没有现代空间运动这样迅猛、壮阔，因为古代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封闭性质的农业社会，此外，我国确曾长期存在以天朝上国自居的社会文化心理，以更重要的是由于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状况下的交通条件落后的制约，应当承认，当时历史是向时间运动倾斜，空间运动是相对缓慢、狭小，时空运动是不平衡的。近三百年来的这一不平衡更加明显、突出。

^①N·金格里奇《机会之窗》，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不过，对于近三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封闭和空间运动的局限，不能仅仅归结或主要认为是由于中国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的结果。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历史中空间运动的范围、作用的局限性，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由于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自然分工，男耕女织，产品主要是自家消费与分配，对外交换部分较少，因而缺乏对外交往的动力，使整个社会具有自我封闭性。此外，我国根深蒂固的宗法文化和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形成普遍强烈的“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的家族主义^①，致使人际交往狭隘，社会关系不发达。还由于我国土地辽阔，这一地理环境，使古代的空间运动——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冲突与融合，大都表现为“体内循环”。因此，从整个古代来看，空间运动狭小、缓慢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不过，对明中后叶以来的中国社会空间运动的局限，似应注意下述因素：这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没有自由交往的权力，个人的对外交往，受家长 and 家规、家法的限制，国家的对外交往，则是在专制君主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这势必局限人际交往与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活动。因为，传统社会的家长，通常害怕外界对传统文化、习俗冲击和挑战的“精神污染”，为此，有的家长把“毋入城市、毋传时事”列为家规^②，有的家长甚至限定子弟“出游不得越二十里外”^③。至于全国大家长的专制君主，则历来重视“华夷之辨”，到了清代，害怕外国人，成为封建皇帝的一种心理病态。对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不是从经济上，而是从政治上剖析当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闭关锁国——引者注）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往来，要往来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

如果抛开明、清闭关锁国的成因，审视闭关锁国的后果，显而易见，阻隔社会与外部世界的横向的空间运动，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是严重的。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史，不能不对中国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空间运动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由于空间是多维的，社会历史的空间运动具有多向性和相向性、互动性，重视社会历史的空间运动的研究，就有可能多角度地审视历史，从不同角度进行历史“对话”，探寻社会随机性和历史变数与恒数的统一，以避免对复杂曲折、多姿多采的历史认识上简单化。

①《国语·晋语四》。

②见《清史稿·孝义传·任天笃》。

③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8《薊州郝氏》。